



工业题材一直是天津作家情有独钟的书写领域,天津的工业文学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之后,孙犁主持《天津日报》副刊期间,开始倡导工人写作。在新时期文学中,蒋子龙、肖克凡等均有代表性作品闻名全国。近年来,以工业文学创作而为大家所瞩目的则有武歆为代表。他先后出版了《三条石》《赶路》《师傅》三部作品,采用不同体裁表现天津工业文化,书写出新时代的津味儿工业文学。

在天津,许多工业文学的作者都有切身的工厂经历。这种体验绝非蜻蜓点水式的到此一游,而是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他们许多人都曾将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工业建设,武歆也不例外。高考落榜后,18岁的武歆进入工厂,作为一名铆工工作了6年。这6年在他的生命中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也成为他日后工业文学创作之不竭的富矿。他曾说:“我要用更多文学体裁来表现工人的精神气质,借以抒发我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工人情结’。”(《“工人情结”与我的写作》)数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再三回顾,从各种角度深耕工业文化。从切身

津派文化的文学表达(四)

武歆: 书写津味儿的工业文学



王云芳

体验到了文字书写,中间隔着作者的想象与创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科技的变革,当沉重的工业劳动方式逐渐远去,过往的痛苦体验逐渐变得轻盈。他的创作,最终在个人和社会怀旧思潮的双重影响下,成为记录过往工业文明与天津地域文化的华美篇章。

回顾武歆早期的工业文学写作,最初集中在中短篇小说,比如《天车》《风砂轮》《抓贼》等作品,揭示出相对单调的工厂劳动对个体的异化,描摹了个体中微妙的人际关系与人情世故,展现了工厂改革中个体面临的种种困境。篇幅限制使得这些作品常常只能表现工人生活的某些横截面。而近年来,随着写作功力的日益深厚,武歆在工业文学领域已然做好了充分的创作准备。他不再满足于揭示时代漩涡中小我人性的渐变,而是将创作的中心点从小我转移到了大我。从纵向的维度来看,这些作品偏爱以个体的成长经历串联起时代社会的变迁。比如长篇小说《赶路》,通过小人物纪洪寿的人生经历,以其职业身份从农民一鞋匠一工人的变化,间接揭示出近百年来天津工业发展的脉络;而横向维度上,作者着力挖掘天津地域的文化底蕴。随着主人公的活动轨迹,通过细致描写其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天津的人文景观、民风民俗甚至方言俚语等都自然地铺展开来。经纬交错,绵密细致的书写,使作品整体呈现出厚重的史诗特质。

武歆的工业书写,尤其是散文集《师傅》,为津味儿奇人增添了一个新的谱系——工人形象。工业文化,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大机器生产、流水线的运转都要求工人必须遵守严格的秩序与管理。传统的工人形象叙事中,人大多被书写为依附于机器的劳动者。他们被迫适应机器运转的节律,忍受沉重的体力劳动,甚至自身似乎也被异化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而武歆笔下的工人师傅,骨子里更像是工匠。以往津味儿文学中的许多奇人形象其实都属于传统工匠的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工匠包含的门类虽然有所变化,但其内在追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却一脉相承。散文集《师傅》中,武歆就为读者塑造了一群“驯服”现代机器的奇人。他们熟练掌握各种机器的精密规律,工作中仿佛庖丁解牛般神乎其技。这些工人师傅堪称现代版的奇人。他们推崇技术,不仅胜任本职工作,更是心灵手巧,擅长利用各种废弃材料制作生活用具。他们饱含创造的激情,用勤劳的双手和踏实的劳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尽管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但历史的尘埃掩盖不住这片土地培育出的熠熠群星。武歆的深情书写,使这些工人形象和他们的技艺都鲜活地留在了人们心中。

对文学来说,趣味是衡量作品艺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地方色彩是构成文本趣味的一种重要方式。当武歆将天津地域文化浸润到其工业书写的方方面面,这些工人师傅的形象生发出了特有的津味儿底蕴,散发出迷人的光辉。地方色彩并不一定意味着狭隘,生动细腻的区域书写往往更能以小见大,于普遍性中让人们看到人类文明的丰富多彩。

一路行至南门区域,迎面即是月季花广场。老人孩童各得其所:有人轮滑穿梭,有人推童车闲行,有人驻足赏花,有人静沐暖阳,在春风里安放身心。行至终点,登上那座红色铁质观景桥。桥体分布于园东、南两侧,高台与廊道相连,形如长城烽火台,连绵有致,气势自生。凭栏远眺,园内外景致尽收眼底:西侧高架桥如长龙卧波,车流疾驶;湖水如镜,花木如画,游人或漫步或嬉游,皆成画中景致。春风拂面,携花香与笑语而来,令人胸臆舒展,烦恼尽散。

伫立良久,心中不免念及旧日战友。若他们也能重临此地,看见这片挥洒汗水的土地如今这般秀美,会是何等心境?大抵也会同我一般,默然伫立,看春水东流,看繁花满枝,于无言中怀想当年的青春岁月。

我频频举手机拍照,想把这山水花木、人间春意一并定格收藏。可我亦明白,有些景致无法封存——风里的旧忆,土地上的蜕变,一名老兵立于春日,与青春遥遥相望时心底的温热,都只藏在此刻,藏在此地。

己设计、连夜赶刻出来的代表民盟云南支部的“田省三印”,代表秘书处的“刘宓”和代表宣传部的“杨亦莹印”的石章。我当时望着一多布满血丝的眼睛,接过了三枚图章,深深地为一多的忘我精神所感动。”

闻一多先生在创作《九歌(古剧翻新)》时,或许因楚图南先生学识渊博、眼光独到,便将自己创作的手稿送给他。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这部《九歌》手稿成为两人精神共鸣的载体,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也是对光明未来的期盼。

1946年6月底,云南各界人士在昆明发起万人签名运动,要求和平。昆明的特务拟定了逮捕、暗杀民盟负责人的名单。李公朴被列为第一名,闻一多列为第二名。7月11日晚,李公朴外出归途中,于青云街大兴坡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次日凌晨逝世。

李公朴的牺牲激起了云南各界的极大愤慨。1946年7月15日下午,李公朴先生遇难情况报告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闻一多与楚图南不顾个人安危出席。会后,楚图南和闻一多又去参加了在民主周刊社召开的李公朴被害事件的记者招待会,他们在会上要求严惩凶手,以慰民心。记者会结束后,出于安全考虑,楚图南计划自己先走。楚图南之子楚泽涵在《楚图南在美国领事馆避难记》一文中写了那天情形,楚图南叮嘱好友闻一多在自己离开后稍晚一点再走,而且他还劝闻一多回家时一定要改变一下路线,切不可跟以往一样。楚图南走出民主周刊社后,没有走往常回家的正路,而是拐进了一家小理发店,进入理发店后迅速从后门离开,转入小路回到家中。正因为临时改变了行程路线,楚图南幸运地躲过了特务的暗杀。而闻一多先生还是按往常的路线回家,在途中,先生惨遭早已埋伏好的国民党特务枪击,倒在血泊之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47岁。

在闻一多纪念馆朱兴中、蔡晓霞撰写的文章《闻一多与楚图南》一文中曾提及这样一段往事:闻一多先生牺牲的噩耗传来,楚图南先生悲痛欲绝,他失去了珍贵的挚友,国家失去了勇敢的战士。1946年10月4日,楚图南不顾个人风险,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在会上,楚图南悲愤交加、饱含深情地讲述了闻一多先生生平,他为好友闻一多题写了这样的挽联:时局多艰,悲国土,争民主,求和平,与奸邪搏斗,不惜一死;风雨如晦,怀故人,同忧患,共肝胆,愿朋侪摧折,安得勿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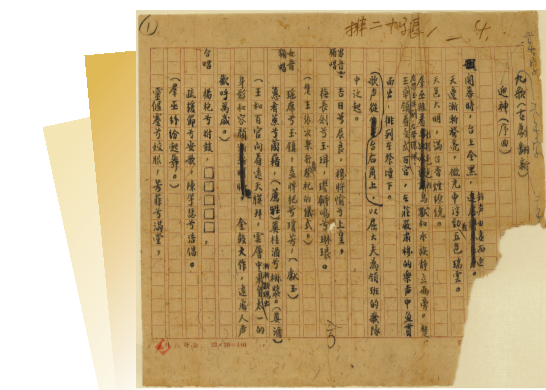
闻一多牺牲后,面对好友的手稿,楚图南深知这份《九歌(古剧翻新)》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挚友的心血结晶,是挚友未竟的文化理想。楚图南先生将这份手稿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生活如何艰难,始终细心保管,视若生命,这一藏,便是数十载春秋。

在其后的岁月中,楚图南一直深深地怀念着自己的故友闻一多先生,他多次撰文讲述闻一多先生的故事。198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在湖北浠水县成立闻一多纪念馆。1988年,纪念馆希望请楚图南先生为正在筹建的闻一多纪念馆题写馆名,楚图南欣然同意。1990年,闻一多纪念馆到楚老挥毫泼墨写下的“闻一多纪念馆”书法作品。

1994年4月11日,楚图南先生在北京安然离世,享年95岁。楚图南先生离世后,其子楚泽涵秉承父亲遗愿,将闻一多这份手稿残稿无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还有几个月就是闻一多先生牺牲80周年的日子,回望历史,闻一多先生作为民盟的杰出前辈,用生命践行了为民、为人民奋斗的誓言,他的精神,如同红烛一般,燃尽自己,照亮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而楚图南先生用一生的守护,诠释了挚友相知的赤诚,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留存。

一部残稿寄深情

慕津锋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珍藏着一件泛黄的文物,它是楚图南先生生前珍藏的一部残稿。这篇是闻一多先生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著作,题为《九歌(古剧翻新)》。这部历经八十载风雨洗礼的手稿,不仅是闻一多先生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最后绝响,更是他与挚友楚图南先生深厚情谊的永恒见证。纸页间流淌的不仅是笔墨书香,更有家国情怀、文人风骨与生死之交的赤诚。

《九歌(古剧翻新)》的珍贵原貌

《九歌(古剧翻新)》残稿2013年由楚图南之子楚泽涵先生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部残稿保留了闻一多生前创作、修改的原始痕迹,每一处笔墨、每一个标注,都诉说着在那段山河飘摇、动荡颠沛的岁月中,闻一多先生的文学坚守,极具史料价值与文物价值。

这份残稿正文共六页,另有一页单独用毛笔书写着“闻一多同志九歌诗剧手迹”。虽非完整手稿,却留存了闻一多《九歌(古剧翻新)》的一些创作内容,字里行间满是作者对这部作品的重视。

从内容编排来看,手稿篇章清晰可见,体例完整,兼具文学性与舞台表演性。该稿共三篇,稿纸为“时代评论22×20=440”红色竖格纸,第一篇《迎神(序曲)》,共两页,页面顶部标有“排二十字长”字样,及每段“男音独唱、女音独唱、合唱”;第二篇《东君》,共两页,在篇名处标有括号,注“二号字”,页面顶部同样标注了每个段落演唱的形式“男音独唱、合唱”;第三篇《云中君》,篇名处同样写有“二号字”,共两页,演唱形式标注为“女音合唱、独唱”。从《迎神(序曲)》《东君》《云中君》可见,闻一多先生是想将《九歌》打造成一部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舞台表现力的歌舞剧,力求让其以全新的艺术形式焕发生机。《迎神(序曲)》为男女混合演唱,《东君》则为男声演唱,可尽显雄浑庄重;而《云中君》为女声演唱,可尽显女性的温柔,三个篇章在演唱形式上各有不同,显示出闻一多先生对不同神灵气质的精准把握,以及对舞台艺术的精湛构思。

手稿虽有删改但字迹工整,演唱形式标注清晰,表明即使在硝烟弥漫、局势动荡的岁月里,闻一多先生依旧以极致的严谨与赤诚对待这部作品。而这份手稿得以保存,与我园著名作家、书法家楚图南先生有紧密关联,该稿是两位挚友文学相知、生死相托的直接见证。

闻一多创作《九歌》的初心与历程

闻一多先生一生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

与新诗创作,而《九歌》的改编与创作,是他学术生涯与文学创作生涯的收官之作,更是在民族危亡之际,以文化唤醒民族精神的深情寄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先后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在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在云南鲜为人知的往事》一文记载,闻一多先生从长沙至昆明,一路步行。这一路历经艰辛,他亲眼看到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其内心的家国情怀愈发浓烈。在旅途中,他接触到西南众多少数民族的独特音乐与艺术形态。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他继续深耕古典文学研究,尤其对《楚辞》有着极深的造诣。《闻一多(九歌)手稿:生命的绝唱》一文也曾提及这段往事:那段时间,他有机会便去云南各地采风,渐渐便萌生了要将屈原《九歌》进行“古剧翻新”,改编为现代歌舞剧的想法。身处抗战洪流之中,闻一多先生深知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要想唤醒民众的爱国情怀,就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在昆明,他常带领学生到山区去采风,在那里,他看到大量极具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歌舞,这些艺术形式质朴动人,他深受启发。

1946年5月19日,由闻一多的学生们组织筹划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圭山彝族音乐舞蹈会”在西南联大草坪举行了预演。整场演出突出了反对内战、坚持和平的主题,发出了中国必然新生的时代强音,展示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和奋发向上的磅礴力量。据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的文章记载,演出结束后,闻一多对演出进行了高度评价:“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我们认识了这民族的无限丰富的生命力。为什么要用生活的折磨来消耗它?为什么不让它给我们的文化增加更多样的光辉?”这次“圭山彝族音乐舞蹈会”让闻一多先生感触良多,他被彝族原生态歌舞深深吸引,这极大地激发了他对自己构思多年的《九歌》的创作热情。《闻一多(九歌)手稿:生命的绝唱》一文中曾写到,闻一多在看到民间优秀歌舞表演者在西南联大的联合演出后,准备在吸收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等新鲜素材的基础上,用歌舞剧的形式重新演绎《楚辞》中的《九歌》。其后,闻一多便全身心投入《九歌(古剧翻新)》的创作中,他结合自己数十年的《楚辞》研究成果,既保留原诗的浪漫意境与文化内核,又力图融入现代舞台艺术的表现形式,精心设计每一篇章的演唱、合唱形式,反复打磨词句与排版,力求做到学术严谨性与艺术观赏性的完美统一。

闻一多与楚图南的生死之交

闻一多与楚图南的交往始于1939年。

1938年年底,闻一多与孙毓棠、陈铨等老师在西南联大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话剧团”,以排演新式剧目宣传抗日救亡思想。1939年7月13日,闻一多等人邀请著名戏剧家曹禺先生来滇交流。7月16日,闻一多等人组织了欢迎曹禺茶会,还特地邀请了在云南大学任教的楚图南参加会议并发言。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二人正式相识。1943年夏秋之时,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代表华岗奉命来到昆明,秘密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他积极在知识界和云南各阶层开展工作。在这期间,华岗同志发起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团结各方人士,楚图南很早便加入其中。闻一多纪念馆朱兴中、蔡晓霞撰写的文章《闻一多与楚图南》一文中曾提及,在研究是否邀请闻一多加入时,党内一些同志有些分歧,有人认为闻一多早年是“新月派”,他曾信奉过国家主义。到了云南,全国人民都在积极抗战,他却钻进自己的“小楼”中,醉心于经史、《楚辞》的研究。像他这样的人,能和大家走到一起来真心抗战吗?面对质疑,华岗向大家展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的亲笔信。周恩来在信中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周恩来的意见启发了众人,大家不再有争执。楚图南按照组织要求主动加强与闻一多的接触。很快,闻一多、潘光旦、费孝通、曾昭抡、闻家驊、尚钺等人先后加入西南文化研究会。研究会每周召开一次座谈会,正是在不断的交流中,闻一多与楚图南深深为彼此深厚的学识与共同的爱国情怀所吸引,成为知己。

西南联大时期,昆明虽是大后方,却也笼罩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进步师生追求民主、反对独裁的呼声,遭到反动派的残酷打压。闻一多先生毅然投身民主运动,1944年经吴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以笔为枪、以言为刃,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在采访楚图南的儿子楚泽涵教授时,他曾提到楚图南先生与闻一多先生的交往,两人志趣相投,同样心怀家国、坚守正义,在昆明共事相处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促膝长谈,谈文学、谈学术、谈国家前途、谈民族命运,虽也有分歧,有争论,有不同见解,但彼此欣赏,彼此尊重,逐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有一件往事,让楚图南一生难忘。他在晚年撰写的《纪念战友闻一多》一文中,曾谈及此事:“一天晚上,当民盟云南支部的组织机构确定后,朋友们便把这些组织机构化名列刻图章的工作委托给一多。第二天的清晨,一多就来到了我家,用颤抖的手,递给我三枚由他自

满庭芳

第五四七期

天津市区离我家最近的湿地公园,想来应该是桥园。公园于2008年10月正式建成开放,曾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世界建筑节上荣获全球最佳景观奖,为我们的城市留下了一抹值得骄傲的生态荣光。

而在我心中,它的意义远不止一座公园那么简单。每至春风回暖、草木萌动之际,我总要择闲前来一游。若不然,总觉得辜负了一年中最好的光景,更辜负了这片与我半生牵系、血脉相连的土地。这里曾是军营靶场,承载着我与战友们瞄准十环、历练精兵的抱负;那座山体高处,也留存着三十年前我与战友们筑台垒土、挥汗劳作的印记。当年此地,不闻花香,唯有阵阵枪声;不见游船,放眼可见靶台。岁月流转,枪声远去,昔日的荒洼靶场,化作今日满目清嘉。

因此,春日赴桥园,于我从不是一次寻常踏青,而是一场藏于心底、经年不改的约定。春至不误期,我亦不相负。我赴的是春光,更是回望那段不曾褪色的青春岁月。

入园即见一泓“7”字形水域,水天一色,澄澈明净。

清澈的水面之下,红鲤、金鲤悠然潜游,动静相宜。它们时而吐泡衔波,似与春光低语;时而穿游于水草之间,搅起细碎涟漪,缓缓漾开,复又归于平静。偶有野鸭携雏逐波而行,从容自若,仿佛这一湖春色本就是它们的天地。幼鸭紧随其后,或振翅试水,或俯身觅食,憨态可掬,一派天然野趣。

湖面之上,脚踏游船轻缓划过,桨板翻起晶

莹水花。船上孩童笑语清脆,随风飘向远方,与岸畔吉姆乐园的欢腾之声交织相融,汇成一曲生机盎然的春日乐章。伫立岸边凝望,恍惚间会觉得时光交错——三十年前,我们亦有属于自己的“乐园”,那是烈日下的靶场,最大的欢喜,是争先进一枚枚滚烫的弹壳。

移目岸上,又是一派蓬勃生机。芳草初生,绿意渐浓,低洼湿地间,蒲草与芦苇已抽新芽。亲水平台伸至水中央,悠闲的老人

在此舒展身心,偶闻一曲高歌,尽享春日闲适。绿地之间,平枝梅与刺梅悄然抽枝,含蓄而坚韧;迎春花、连翘次第绽放,一片金黄肆意铺展,明媚动人;桃、杏、梨花相继盛开,粉白交错,层叠如云;空气中浮动清润花香,深吸一口,心神皆畅。

吉姆乐园内热闹非常。临水而设的激流勇进、依杨柳而建的攀岩、登高等项目,不时传来孩童们略带紧张却满含欢快的呼喊;碰碰车往来穿梭,碰撞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喧闹之中,几株



冯清勇

我和桥园有个春约

位于喀斯特峭壁之上的悬崖书店、可俯瞰怒江大峡谷的山顶书店、与公园景观融为一体的汉代风格书楼……近年来,一批镶嵌在自然山水与城市风景中的书店频频出圈,它们打破阅读空间与自然景观的界限,让书香与山水相逢、诗意与远方相融,成为文旅融合的新风景。

“书店+风景”模式,可以说是文旅行业提质升级与全民阅读推广的双向奔赴。对文旅行业而言,它较好地填补了景区文化生态的空白,为自然山水与城市风景中的书店频频出圈,它们打破阅读空间与自然景观的界限,让书香与山水相逢、诗意与远方相融,成为文旅融合的新风景。

“书店+风景”模式,可以说是文旅行业提质升级与全民阅读推广的双向奔赴。对文旅行业而言,它较好地填补了景区文化生态的空白,为自然山水与城市风景中的书店频频出圈,它们打破阅读空间与自然景观的界限,让书香与山水相逢、诗意与远方相融,成为文旅融合的新风景。

“书店+风景”的模式,令人向往,却也存在着一些发展隐忧。比如,景区书店多依赖旅游旺季,淡季客流稀少,加之偏远景区物流、运维成本较高,盈利压力极大。再如,部分书店盲目模仿“网红”设计,缺乏在地文化内核,难免陷入“千店一面”的困境,容易沦为单纯的“打卡点”,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让“长”在风景里的书店好景长在,或许更需在差异化、融合化上精准发力,破解发展难题。首先要深耕在地文化,打造差异化核心竞争力。因地制宜挖掘本土文化,是景区书店避免同质化的一个关键所在。建筑设计上,可与自然景观、地域文化深度融合,如云南省怒江大峡谷的一家书店以傣族族弩弓为灵感设计造型,海岱楼钟书阁凸显汉代风韵,让书店本身就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内容运营

上,可聚焦本土特色,设立地方文献专区、本土作家专柜,收集整理民族文化、地域历史相关书籍,让游客通过书籍读懂当地故事。业态创新上,可将非遗体验、民俗展演、文创开发与阅读相结合,让文化可触、可感、可带走。

其次要创新运营模式,构建多元融合生态。书店可转变“售书为主”的传统思路,相关部门可拓展“书店+”模式打造复合型文旅空间。一方面,联动景区、文化机构、文旅部门,共建文旅生态,如联合旅行社开发“阅读+研学”线路,与非遗工坊合作推出体验活动,形成“阅读+体验+旅游”的闭环。另一方面,也可以打造专属文化产品,开发衍生产品与服务,从“卖书”转向“经营文化”,通过主题活动、线上传播等方式,提升书店的文化辐射力与商业价值。同时,还可以借助数字化手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体验场景,打破时空限制,扩大书店的影响力。

需要指出的是,景区书店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多方合力。相关政府部门可以出台扶持政策,在场地租赁、税收减免、文化补贴等方面给予支持,降低书店运营成本。文旅部门可将书店纳入景区整体规划,统筹做好客流引导、宣传推广工作。书店运营方则可与景区深度合作,共享资源、共拓市场,将书店融入景区游览线路,成为游客歇脚、体验、消费的重要场所。

山川为卷,书香为墨。“长”在风景里的书店是文旅融合的诗意探索,也是全民阅读的生动实践。唯有扎根本土、守正创新、协同共进,才能让这些风景中的文化空间,既成为游客旅途中的诗意栖息地,也成为传承文化、滋养心灵的长久地标,借此助力“诗与远方”永不落幕。

拾柴篇



好景长在 让风景里的书店

周慧虹